

# 收入视角下西北脱贫农户返贫潜在风险评估

——基于甘南州X县实地调查

杨 蓝, 赵建琴, 仁青草

(兰州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兰州 730000)

**摘要:** 后扶贫时代,防止脱贫人口规模性返贫成为底线要求,对于曾是深度贫困且摘帽较晚的西部地区更是如此。基于当前反贫困领域的代表性成果,通过文献研读、实地调研和半结构式访谈等研究方法,从收入水平、收入波动和收入“水平-波动”3个维度对甘肃省甘南州X县183户脱贫家庭展开返贫风险评估。围绕政策、产业、医疗、保险4个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巩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脱贫攻坚成果、完成整个5年过渡期“三农”工作的目标任务提供启示。

**关键词:** 返贫风险; 脱贫农户; 乡村振兴; 收入视角

**中图分类号:** F323.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1807(2024)03-0080-07

截至2020年底,我国已实现了现行标准下的9 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绝对贫困得以消除。然而,农村生计系统的脆弱性、生产要素与资源配置转换的受限性、自然环境的复杂性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的低交互性<sup>[1]</sup>,导致脱贫人口返贫的压力将长期存在。特别是,对于当初因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和贫困程度深而被确定为国家层面深度贫困地区的“三区三州”(“三区”是指西藏自治区,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等4省内的藏区和南疆的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等地区,“三州”是指四川省的凉山州、云南省的怒江州和甘肃省的临夏州),以及贫困发生率超过18%和20%的贫困县与贫困村,在由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的过渡期中,更是面临着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风险。

对此,2021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要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做到扶上马送一程。要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对易返贫致贫人口及时发现、及时帮扶,守住防止规模性返贫底线。换言之,在这5年过渡期内,既需要承认脱贫人口有可能出现返贫的客观现实,但同时

也需要将脱贫人口的返贫规模和程度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防范大规模深度返贫的风险。要加快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以及因新冠肺炎疫情或其他原因收入骤减或支出骤增户加强监测,提前采取针对性的帮扶措施,不能等他们返贫了再补救。

随着我国的贫困治理目标从“精准扶贫”阶段的解决大面积确定性贫困转向了瞄准少部分不确定贫困,贫困治理模式也需要从事后治理模式转向事前、事后并重的多维度治理模式。那么,在中央为脱贫地区设立的5年过渡期中,如何梳理过渡期脱贫人口易返贫的潜在风险点,实行动态和精准防贫策略,从根本上化解致贫返贫风险,帮助脱贫人口避免陷入“扶贫-脱贫-返贫”的恶性循环,从而实现可持续脱贫,已成为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因此,以“返贫现象主要是通过收入水平和收入波动表达出来的”作为逻辑起点,构建返贫潜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从收入的水平和波动维度对甘肃省甘南州X脱贫县农户进行潜在返贫风险调查,并尝试提出相应的干预策略,以期为完善西部民族地区防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提供经验证据。

**收稿日期:** 2023-11-01

**作者简介:** 杨蓝(1997—),女,藏族,甘肃甘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成本与管理会计;赵建琴(1998—),女,藏族,甘肃甘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成本与管理会计;仁青草(1998—),女,藏族,甘肃甘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成本与管理会计。

## 1 返贫成因与返贫风险的理论综述

当前,学术界对返贫成因的研究虽然依旧呈碎片化,但普遍认为贫困及返贫发生的核心根源与生计的不确定性联系在一起。这种不确定性既包括缺乏参与经济活动和选择的基本自由,也包括缺乏获得足够食物、住所、教育和医疗等的自由。这些都导致贫困人群极易受到疾病、经济萧条、自然灾害等突发性事件的影响。

从既有研究来看,可围绕生计不确定性将返贫成因归纳为三大类,即政策性返贫、能力性返贫和资源性返贫。政策性返贫指当反贫困干预力量减弱或退出时出现的脱贫人口收入水平大幅波动进而诱发返贫的现象<sup>[2]</sup>,一般与区域性扶贫制度、政策举措的碎片化、重消除“生存性贫困”而轻消除“发展性贫困”的倾向有关<sup>[3]</sup>。能力性返贫指由于贫困人群内生动力不足而造成的返贫困境,即脱贫户“抗逆力”不强<sup>[4]</sup>。能力缺乏多与贫困人群自身行为、习惯、文化以及受教育程度有关。尤其在农村地区,相比于非贫困家庭,贫困家庭在收入水平,以及诸如教育、医疗、就业、婚姻等其他社会因素方面均有明显的劣势,并且这种劣势的代际传递特征明显。研究表明通过发展农村金融,可从提高收入、教育和医疗 3 个方面有效缓解贫困代际传递<sup>[5]</sup>。资源性返贫,即由脱贫人群内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而造成的返贫,一般与其自然禀赋、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状况、生产生活条件、自然灾害发生状况等因素相关<sup>[6]</sup>,多为结构性背景。

返贫风险则可被视为各返贫成因的累积和循环,不同学者依据不同的角度对返贫风险进行了细化。例如,从生计资本角度出发可将返贫风险细分为人力资本风险、金融资本风险、自然资本风险、物质资本风险、社会资本风险以及外部环境 with 政策风险<sup>[7]</sup>;从贫困地区特点出发,可将返贫风险划分为能力缺失风险、政策性返贫风险、环境性返贫风险、发展型返贫风险<sup>[8]</sup>。此外,不少学者也围绕返贫现状和风险特征,从中国特色贫困治理体系<sup>[9-10]</sup>、相对贫困的生成逻辑与治理<sup>[11-12]</sup>,以及构建相对贫困的长效治理路径<sup>[13-15]</sup>等方面积极展开研究,为现阶段我国贫困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民族地区作为我国返贫防控的关键点和薄弱点,也是规模性返贫风险的易发地区,不同民族地区之间往往差异性较大,且不同风险之间相互关联,因此其规模性返贫风险一般呈现出区域性、群体性、联动性等特征<sup>[16]</sup>。然而,当前针对民族区域的返贫研究多集中

于返贫理论阐述、返贫成因及风险治理等定性研究,基于多维度视角,研究某特定民族区域返贫问题的定量研究还有待补充。

## 2 基于收入视角的返贫潜在风险评估体系构建

“收入”作为全球使用最为广泛的贫困标准,是衡量脱贫的重要代理变量,所谓“相对贫困”,即指与社会平均水平相比,收入水平低于一定程度时所维持的社会生活状况。与全国相比,民族地区相对贫困问题更加明显,相较于其他指标能够最为直观地展示脱贫农户的经济状况<sup>[17]</sup>。依托左停和苏青松<sup>[18]</sup>的防返贫综合分析框架,以“返贫现象随收入水平和收入波动而表达”作为分析维度,结合其他风险因素,构建返贫潜在风险评估体系(表 1)。

具体而言,收入的水平维度分为收入变化和收入构成两个二级指标。收入变化包括年总收入、年可支配平均收入和近 3 年内的收入;收入的波动维度包括但不限于劳动力、生产环境、灾害疫情,以及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下可能带来的收入波动;水平-波动双维度,基于熵权法对脱贫农户进行返贫风险综合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将脱贫人群划分为稳定脱贫人群、暂时性困难人群、边缘人群和易返贫人群 4 种类型。

## 3 基于收入视角的返贫潜在风险评估实证研究

一直以来,民族地区的脱贫攻坚工作受到高度重视。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过渡的甘肃、青海和四川 3 省结合部,是我国 10 个藏族自治州之一,2017 年,被纳入甘肃省“两州一县”深度贫困地区。与其他偏远少数民族地区一样,甘南州因地理位置偏远,增长方式单一等历史原因,曾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sup>[19]</sup>。X 县作为甘南州各市县脱贫攻坚的典型代表,2002 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2014 年,按照《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要求,确定了 16 个贫困村,共计 2 062 户。2018 年,X 县当年减少贫困人口 2 032 人,贫困发生率降至 0.8%,得到甘肃省人民政府的批准退出了贫困县。然而,因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和贫困程度深而被确定为国家深度贫困地区,这些因素决定了 X 县依然是面临较大返贫风险的代表性区域。由此,以 X 县为研究地区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表 1 基于收入视角的返贫潜在风险评估体系

| 一级指标 | 二级指标     | 三级指标          | 指标含义及赋值                                                                       | 指标属性 |
|------|----------|---------------|-------------------------------------------------------------------------------|------|
| 收入水平 | 总收入      | 家庭年总收入        | >70 000 元=5,70 000~50 000 元=4,50 000~30 000 元=3,30 000~10 000 元=2,<10 000 元=1 | 正向   |
|      |          |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 >10 500 元=5,9 000~10 500 元=4,9 000~7 500 元=3,7 500~6 000 元=2,6 000~4 500 元=1  | 正向   |
|      |          | 近 3 年收入变化     | 持续上涨=5,持续下降=4,大幅波动为 3,较为稳定=2,无变化=1                                            | 正向   |
|      | 收入构成     | 非政府保障或扶贫补贴    | 以非政府保障或补贴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衡量,无政府保障或扶贫补贴=1,比重为 0~0.2=2,0.2~0.4=3,0.4~0.6=4,>0.6=5    | 正向   |
|      |          | 政府保障或扶贫补贴     | 以政府性保障或补贴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衡量,无政府保障或扶贫补贴=1,比重为 0~0.2=2,0.2~0.4=3,0.4~0.6=4,>0.6=5    | 负向   |
| 收入波动 | 劳动力状况    | 劳动力年龄         | <18 岁=5,18~30 岁=4,31~45 岁=3,46~60 岁=2,>61 岁=1                                 | 负向   |
|      |          | 劳动力健康状况       | 非常健康=5,比较健康=4,一般=3,不太健康=2,不健康=1                                               | 正向   |
|      |          | 劳动力家庭占比       | 以劳动人口占家庭总人口的比重衡量,比重>0.8=5,0.6~0.8=4,0.4~0.6=3,0.2~0.4=2,<0.2=1                | 正向   |
|      | 生产生活条件   | 耕地面积          | 非常充足=5,比较充足=4,一般=3,比较缺乏=2,非常缺乏=1                                              | 正向   |
|      |          | 牧草地面积         | 非常充足=5,比较充足=4,一般=3,比较缺乏=2,非常缺乏=1                                              | 正向   |
|      |          | 林地面积          | 非常充足=5,比较充足=4,一般=3,比较缺乏=2,非常缺乏=1                                              | 正向   |
|      |          | 牲畜数量          | 非常充足=5,比较充足=4,一般=3,比较缺乏=2,非常缺乏=1                                              | 正向   |
|      | 疫情影响     | 对收入来源的影响      | 四项受到影响=5,三项受到影响=4,两项受到影响=3,一项受到影响=2,无影响=1                                     | 负向   |
|      |          | 对收入的影响程度      | 非常大=5,比较大=4,一般=3,比较小=2,无影响=1                                                  | 负向   |
|      | 政策依赖     | 享受的政策数量       | 享受的政策数量≥7=5,5~6=4,3~4=3,1~2=2,未享受=1                                           | 负向   |
|      |          | 政策效果          | 非常明显=5,效果较明显=4,一般=3,效果较小=2,效果不明显=1                                            | 正向   |
|      | 受教育程度    | 劳动力受教育程度      | ≥本科=5,中专或大专=4,初高中=3,小学=2,未受教育=1                                               | 正向   |
|      |          | 受教育程度对收入的影响程度 | 非常大=5,比较大=4,一般=3,比较小=2,无影响=1                                                  | 正向   |
|      | 其他潜在返贫因素 | 非日常支出         | 非常担忧=5,比较担忧=4,担忧=3,有点担忧=2,不担忧=1                                               | 负向   |
|      |          | 子女教育支出        | 非常担忧=5,比较担忧=4,担忧=3,有点担忧=2,不担忧=1                                               | 负向   |
|      |          | 婚嫁嫁娶支出        | 非常担忧=5,比较担忧=4,担忧=3,有点担忧=2,不担忧=1                                               | 负向   |
|      |          | 大病医疗支出        | 非常担忧=5,比较担忧=4,担忧=3,有点担忧=2,不担忧=1                                               | 负向   |
|      |          | 养老支出          | 非常担忧=5,比较担忧=4,担忧=3,有点担忧=2,不担忧=1                                               | 负向   |

为了获取第一手的数据和资料,采用对 X 县脱贫农户进行实地走访,并与驻村干部展开半结构式访谈的方式。在实地走访与访谈中,抽取地理条件各异的脱贫行政村,共获得有效问卷 183 份,基本能够反映脱贫农户的真实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他相关数据及资料均来源于 X 县政府的官方网站和当地乡村振兴局。

### 3.1 收入水平维度的分析

#### 3.1.1 总收入水平分析

收入是脱贫农户最直观和最重要的资本,能够较为直观地展示脱贫农户的经济现状,指数越高,收入越好,代表经济状况越稳定。从结果来看,2021 年样本脱贫农户中,超半数以上的家庭年总收入达到 50 000 元以上,仅有 0.5%的家庭年总收入在 10 000 元以下。51%的脱贫农户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 9 000 元以上,但仍有 8%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在 4 500~6 000 元,已具有一定程度的返贫风险。结合 2021 年全国、全省数据,所有的样本家庭均超过了当年国家贫困标准(4 240 元),其中

有 31.7%的家庭超过了甘肃省当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 433 元),但距离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 931 元,占比 5.5%)仍存在相当大的距离。

#### 3.1.2 收入构成分析

从数据来看(表 2),工资性收入占比均超过 50%,外出务工为绝大部分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低收入组相较于其他组其经营性收入最低,这可能与拥有的可支配资源数量相关。调研统计仅有 28%和 14%的家庭还有来自种植业和畜牧业的收入。此外,超 90%的家庭拥有财产投资收入,包括分红及储蓄性利息收入等,这缘于政府的扶贫投入与当地企业的扶持政策,贫困户可将部分扶贫资金用于购买当地企业的股权,每年享有分红,成为家庭的一部分收入来源,但低收入组财产性收入占比明显高于其他组别,即低收入组对于该部分收入的依赖性也高于其他组别。

为了更直观地反映脱贫农户对相关政策性收入的依赖状况,将收入划分为“政府保障或扶贫补

贴类”与“非政府保障或扶贫补贴类”(表 3),通过这两类收入占家庭年总收入的比重,判断脱贫农户的自力更生能力。非政府保障或扶贫补贴类收入越高,脱贫农户的独立能力越强,收入越稳定,相应的收入风险就越低。从数据来看,79%的脱贫农户基本做到了不依靠政府收入,其中仅有 0.5%做到了收入完全不依赖政府补贴;有 15%左右的农户其半数收入均来自政府保障或扶贫补贴,这类脱贫农户所面临的返贫风险巨大,需要加大返贫监测力度。

表 2 2021 年收入五等分组脱贫农户的收入结构

| 家庭人均<br>收入构成 | 占比/%  |       |       |       |       |
|--------------|-------|-------|-------|-------|-------|
|              | 低收入组  | 中低收入组 | 中等收入组 | 中高收入组 | 高收入组  |
| 工资性收入        | 56.48 | 56.07 | 58.12 | 57.69 | 59.57 |
| 经营性收入        | 2.60  | 10.11 | 5.99  | 12.33 | 9.59  |
| 财产性收入        | 10.50 | 5.13  | 6.60  | 8.53  | 7.13  |
| 转移性收入        | 30.42 | 28.69 | 29.29 | 21.45 | 23.71 |

注:工资性收入主要指外出务工的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主要包括农户种植业(青稞、油料、马铃薯等)、畜牧业(牛、羊、猪、奶制品等)所带来的农业自营收入,以及个体经营的非农自营收入(小卖部、农家乐等);财产性收入主要包括存款利息、投资分红等资产收益性收入(如乡村合作社集体投资的水泥厂、汽修厂、政策性投资企业分红项目等),以及林地、牧草地、空置房间等租赁收入;转移性收入则指政府补贴或救助收入,赡养收入以及捐赠收入。

表 3 2021 年 X 县脱贫农户收入依赖情况统计

| 收入水平<br>指标 | 三级指标                                          | 占家庭总收入比重/% | 占总样本比重/% |
|------------|-----------------------------------------------|------------|----------|
| 收入构成       | 非政府保障或扶贫补贴(主要指工资性、经营性收入)                      | 0          | 1        |
|            |                                               | 0~20       | 0.5      |
|            |                                               | 20~40      | 5        |
|            |                                               | 40~60      | 14.5     |
|            |                                               | >60        | 79       |
|            | 政府保障或扶贫补贴(主要指财产性收入中的扶贫投资分红、转移性收入中的政府补贴与救助收入等) | 0          | 0.5      |
|            |                                               | 0~20       | 37.5     |
|            |                                               | 20~40      | 44       |
|            |                                               | 40~60      | 13       |
|            |                                               | >60        | 5        |

综上所述,此次针对 X 县脱贫农户的收入水平维度调研结果与既有研究结果相一致,即相当一部分脱贫农户总体收入和人均收入依然偏低,且收入结构不合理,来自政府的转移性收入占比偏高,对国家扶贫福利政策依赖度大<sup>[7]</sup>。

### 3.2 收入波动维度的分析

#### 3.2.1 劳动力状况

劳动力是脱贫农户家庭最重要的,数量和质量是劳作的基础,也是脱贫农户家庭未来获得收入的关键因素。通过劳动力占家庭总人数的比重衡量当前脱贫农户的家庭劳动能力,占比越低,表明人

力资本缺失越严重。数据显示有约 45%的家庭,可参加劳动人数占总人口数不到一半。尽管受访农户中 71%的家庭主要劳动年龄集中在 45 岁以下,正值壮年,但家庭总人口数量依旧会给可劳动人员带来不小的压力。据统计,受访家庭中超过 4 人的家庭占 67%,超过 7 人的家庭占 15%,对于这类多人口家庭,可劳动人数占比越低,返贫的风险越大。

#### 3.2.2 生产生活条件

通过统计脱贫农户拥有的耕地、牧草地、林地面积和牲畜数量,可以了解家庭资本状况和利用情况。尽管不同地理位置和村落差异导致脱贫农户拥有的耕地、牧草地、林地面积和牲畜数量有极大差异,然而不论拥有多少牧草地,样本农户均更依赖外出务工和政府补贴,种植农作物和畜牧的家庭比重极低,即使进行农作物种植和牲畜饲养,农业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也很低。这表明当地农户对自然资本的利用程度不高,如何更好地创造价值,将其变现为收入,对巩固当地脱贫成果至关重要。

#### 3.2.3 政策依赖

在精准扶贫阶段,当地政府实施了包括产业扶贫、生态补贴、就业培训、健康援助、教育援助、乡村建设项目和基本生活保障等在内的多项扶贫措施。通过统计脱贫家庭曾享受的政策数量,可大致推测其对政策的依赖程度。结果显示约 42%的农户享受了 4,5 项扶贫政策,即未来随着政策的调整或取消,这部分人群可能会失去这些政策支持,从而面临返贫风险。

#### 3.2.4 受教育程度

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反映了农户的认知水平和机会获取能力。统计显示,脱贫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大多集中在小学(45%)和初高中水平(39%),仅有 1%的接受过本科等高等教育,更有 6%的农户完全没有接受过教育,这可能会限制他们的就业机会,从而影响其获得收入的稳定性。有超过 75%的受访者认为教育程度对收入有重大影响,而认识到这一点的家庭往往也会更注重子女的教育,尽管这也会增加他们的经济负担和潜在返贫风险。

### 3.3 “水平-波动”双维度的返贫潜在风险分析

#### 3.3.1 脱贫人群类型划分

基于脱贫农户的返贫风险评估体系,运用熵权法计算得到脱贫农户在收入“水平-波动”双维度的返贫风险权重,再运用综合评价法,通过每一户

脱贫家庭赋值数据和权重的相乘及累加,对脱贫户的返贫风险系数进行测算,最终得到183户家庭的风险综合得分。得分越低,表明返贫潜在风险越大。

结果显示(表4),在所有的返贫潜在风险评估指标中,收入构成、政策依赖和劳动力状况是返贫风险的主导因素,权重越小,越会拉低脱贫农户的综合得分,增大其返贫风险。这个结果也与实地走访时获得的驻村干部访谈内容一致。同时,这3项指标之间还存在着正向的相关性,即政策依赖程度反映出该脱贫家庭享受到政策倾斜的程度,劳动力状况则是脱贫家庭能否享受到政策倾斜的考量条件之一,而能否享受到相关政策又决定了脱贫家庭的收入结构。

按照前述的风险综合得分,得到样本脱贫农户返贫风险综合得分介于[1.633 4, 3.775 1],按4类人群均分区间,可将受访脱贫家庭划分为:①稳定脱贫人群,得分区间为[2.239 1, 3.775 1],7户,占样本量的4%;②暂时性困难人群,得分区间为[2.703 9, 3.239 0],25户,占比14%;③边缘人群,得分区间为[2.168 7, 2.703 8],104户,占比57%;④易返贫人群,得分区间为[1.633 4, 2.168 6],49户,占比27%,即X县至少有27%的脱贫农户可能存在着较高的返贫潜在风险。

### 3.3.2 不同类型脱贫人群的特征

通过分析样本脱贫农户各单项指标得分与该指标均分的偏离程度,得出:①易返贫人群整体家庭收入远低于其他三类人群,其对养老支出负担的担忧最为严重;相较于边缘人群,易返贫人群的劳动力素质和能力表现更差,这直接影响到了脱贫户的收入结构。②边缘人群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相较于暂时性贫困人群来说是更差的,且该人群对子女教育支出负担的担忧更重,这可能与其家庭结构有关(人口数量多,学龄子女多),据统计,边缘人群中家庭人口超过7人及以上的脱贫农户有19户,占边缘人群总数的18%,这个比重均大于其他3类人群。③暂时性贫困人群的家庭可用劳动力素质要低于稳定脱贫人群,并且相较后者,暂时性贫困人群对婚丧嫁娶和医疗支出的负担压力更大,说明未来存在相关方面大额支出的可能性较大,一方面这可能与当地农村较高的婚嫁彩礼风俗有关,另一方面反映出这类家庭中可能有慢性疾病的成员。

综合来看,相较于其他两类人群,易返贫人群和边缘人群的返贫风险因素更加多维和复杂化,他们在抵御疫情冲击的能力、依赖政府补贴的程度以及劳动力的综合素质表现上都明显不足,同时,这两类人群的生产生活条件也与其他两类人群有较大的差异,家庭拥有的各类自然和畜牧资源也都更少。

表4 X县脱贫农户返贫潜在风险权重

| 二级指标     | 权重/%  | 三级指标        | 信息熵值    | 信息效用值   | 权重/%  |
|----------|-------|-------------|---------|---------|-------|
| 总收入      | 7.27  | 家庭年总收入      | 0.989 9 | 0.010 1 | 1.06  |
|          |       |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 0.968 3 | 0.031 7 | 3.31  |
|          |       | 近3年家庭总收入变化  | 0.971 7 | 0.028 3 | 2.90  |
| 收入构成     | 2.45  | 非政府保障或扶贫补贴  | 0.995 6 | 0.004 4 | 0.46  |
|          |       | 政府保障或扶贫补贴   | 0.981 0 | 0.019 0 | 1.99  |
| 劳动力状况    | 4.19  | 劳动力年龄       | 0.984 6 | 0.015 4 | 1.61  |
|          |       | 劳动力健康状况     | 0.998 1 | 0.001 9 | 0.20  |
|          |       | 劳动能力家庭占比    | 0.977 3 | 0.022 7 | 2.38  |
| 生产生活条件   | 46.21 | 耕地面积        | 0.921 9 | 0.078 1 | 8.17  |
|          |       | 林地面积        | 0.948 9 | 0.051 1 | 5.34  |
|          |       | 牧草地面积       | 0.956 8 | 0.043 2 | 4.52  |
|          |       | 牲畜数量        | 0.730 6 | 0.269 4 | 28.18 |
| 疫情影响     | 7.19  | 对收入来源的影响    | 0.987 9 | 0.012 1 | 1.26  |
|          |       | 对收入的影响程度    | 0.943 3 | 0.056 7 | 5.93  |
| 政策依赖     | 3.44  | 享受的政策数量     | 0.981 4 | 0.018 6 | 1.94  |
|          |       | 政策效果        | 0.985 6 | 0.014 4 | 1.50  |
| 受教育程度    | 4.98  | 劳动力受教育程度    | 0.973 5 | 0.026 5 | 2.77  |
|          |       | 受教育程度对收入的影响 | 0.978 9 | 0.021 1 | 2.21  |
| 其他潜在返贫风险 | 24.20 | 非日常支出       | 0.964 4 | 0.035 6 | 3.73  |
|          |       | 子女教育支出      | 0.907 8 | 0.092 2 | 9.65  |
|          |       | 婚丧嫁娶支出      | 0.964 3 | 0.035 7 | 3.74  |
|          |       | 大病医疗支出      | 0.964 3 | 0.035 7 | 3.74  |
|          |       | 养老支出        | 0.968 1 | 0.031 9 | 3.34  |

## 4 结论与建议

### 4.1 结论

在回顾返贫成因与风险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以收入的水平、波动以及“水平-波动”3个维度作为理论逻辑框架,确立了脱贫农户返贫潜在风险评估体系,基于此展开对甘南州X县的脱贫农户的实地调研,得出以下结论:①收入水平维度层面,相当一部分脱贫农户总体收入和人均收入依然偏低,且收入结构不合理,来自政府的转移性和补贴性收入占比偏高,对国家扶贫福利政策依赖度大;②收入波动维度层面,脱贫家庭普遍劳动力状况不佳、未能充分利用现有的生产生活条件、受教育程度又偏低、对政策的依赖惯性大,且存在不止一种可能由意外支出所导致的潜在返贫风险;③“水平-波动”双维度的返贫潜在风险分析结果表明,在样本贫困农户中,易返贫户达到了27%,仅有4%的样本农户稳定脱贫。

对甘南州X县183户脱贫家庭的实地调研表明,“精准扶贫”阶段所采取的帮扶措施,对实现可持续脱贫的作用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欲从根本上完全化解脆弱性、冲击性等致贫风险,还需实行动态和精准返贫策略,以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 4.2 建议

基于以上调研数据及分析结果,并结合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具体情境,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可能采取的返贫干预建议。

(1)政策扶贫。①建立“多维-动态”返贫风险评估机制,对高风险人群实施重点监测。在“两不愁三保障”的基础上,结合货币性指标和其他生计指标,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风险监测机制和脱贫成果考核体系,同时设置不同程度的预警标准线,提前定位返贫风险高危人群,并根据预警的程度制定不同的应对措施。②确立以能力和智力扶贫为导向的长效机制,关注脱贫农户能力提升和自主脱贫。进一步加强脱贫农户的技能培训,包括驾驶技能和民族旅游特色等多元化培训内容,如唐卡、藏餐、藏香、藏族服饰等文化旅游产品的制作。此外,还可以加大对乡村公益性岗位的投资力度,稳定脱贫家庭的收入。

(2)产业扶贫。①推动乡村振兴治理体系建设,结合二、三产业,打造村集体产业,鼓励脱贫户自主创业。一方面,依托地域特色发展农牧业,利用优质资源打造农副产品粗加工产业链;另一方

面,加强乡村集体产业打造,引导农户通过土地租赁、合并等方式规范种植和养殖。②强化“企业+产业+互联网”扶贫模式,通过当地龙头企业和国有企业引导创业项目,培训专业农业技能,孵化和催生优质创业项目企业。同时,完善乡村电商平台,通过媒介传播、合作和物流建设扩大产品知名度和销售渠道,以解决宣传营销不足和物流运输问题。

(3)医疗扶贫。①提升基层卫生公共服务水平。确保卫生院对高龄农户定期体检,并提高农户家庭医疗保险的参保率,防止因病返贫。②扩大脱贫农户医疗保险范围,针对不同类型的脱贫农户设定不同的报销比例。特别是易返贫人群,加大医疗保险的报销力度,降低报销起付线,增加门诊报销力度等,减轻医疗支出负担。③加强大病救助专项项目,重视因当地海拔气候引起的高发疾病,如慢性高原病、白内障等地方病的防治工作。

(4)保险扶贫。①积极完善各种风险补偿机制,发展特色保险产品,通过政府适度补贴农户购买保险服务的方式,发展各类扶贫型保险,提升脱贫人群的保险覆盖率。②依据不同家庭的高风险因素,针对性地补贴商业保险。对从事高风险工作、有遗传病、慢性病史的农户,补贴劳动力意外伤害险、家庭成员重大疾病险和外出打工失业险;对从事种植业、畜牧业的农户,可补贴农业保险、特色农作物保险和农(副)业生产自然灾害险;对生活区域地理条件差、多自然灾害的脱贫家庭,可补贴农房保险、雪灾保险、火灾保险等财产保险。

## 参考文献

- [1] 左停,徐卫周. 综合保障性扶贫:中国脱贫攻坚的新旨向与新探索[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2019, 40(3): 36-44.
- [2] 张耀文,郭晓鸣. 中国反贫困成效可持续性的隐忧与长效机制构建: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的考察[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0(1): 62-69.
- [3] 白雪秋,余志利. 消除“发展性贫困”:理论基础与现实路径[J]. 上海经济研究, 2019(3): 17-23.
- [4] 胡原,曾维忠. 稳定脱贫的科学内涵、现实困境与机制重构:基于可持续生计-脆弱性-社会排斥分析框架[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46(5): 121-128.
- [5] 杨柳. 农村金融发展能有效缓解贫困代际传递吗?:基于收入、教育和医疗的中介视角[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2, 51(1): 91-100.
- [6] 杨龙,李萌,卢海阳. 深度贫困地区农户多维贫困脆弱性与风险管理[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6): 12-18.
- [7] 付少平,石广洲. 乡村振兴背景下脱贫人口面临的生计

- 风险及其防范[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版), 2021, 21(1): 19-28.
- [8] 耿新. 民族地区返贫风险与返贫人口的影响因素分析[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37(5): 68-75.
- [9] 洪名勇, 娄磊, 龚丽娟. 中国特色贫困治理: 制度基础与理论诠释[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2): 23-37.
- [10] 何家伟, 李超梅. 理论·历史·实践: 构建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制度体系的三维视角[J]. 思想教育研究, 2021(3): 7-12.
- [11] 何眉, 杨肃昌, 陈卫强. 能力视域下相对贫困的生成逻辑与治理路径[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43(4): 119-129.
- [12] 姜安印, 陈卫强. 论相对贫困的成因、属性及治理之策[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1(3): 127-139.
- [13] 王昶, 王三秀. 相对贫困长效治理与政府扶贫能力转型: 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的拓展应用[J]. 改革, 2021(5): 134-145.
- [14] 郑继承. 构建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政治经济学研究[J]. 经济学家, 2020(5): 91-98.
- [15] 曾福生. 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构建[J]. 求索, 2021(1): 116-121.
- [16] 周超, 樊虎. 多维视角下民族地区规模性返贫风险的表征、缘由及对策[J]. 民族学刊, 2022, 13(8): 117-125.
- [17] 郑岩, 孙一平. 乡村振兴中民族地区贫困治理战略转型与进路[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0(1): 107-117.
- [18] 左停, 苏青松. 收入水平与收入波动: 过渡期预防返贫的两个干预维度及精准策略: 结合中国西南一个脱贫县的建档立卡数据观察[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1(6): 10-22.
- [19] 王延中, 丁赛. 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成效、经验与挑战[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41(11): 8-16.

## Assessment of the Potential Risk of Returning to Poverty in Northwest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come: Based on Field Investigation in X County, Gannan Prefecture

YANG Lan, ZHAO Jianqin, REN Qingcao

(School of Accountancy,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post-poverty era, preventing people from returning to poverty on a large scale has become a bottom line requirement, especially for the western region, which was once deeply poor and took off the cap late. Based on the current representative results in the field of anti-poverty, through literature study,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the risk of returning to poverty of 183 families in X County, Gannan Prefecture, Gansu Province was assessed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income level, income fluctuation and “level-to-fluctuation” of incom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rom four aspects, including policy, industry, medical care and insurance,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northwest minority areas, complete the goals and tasks of the “three rural areas” work during the five-year transition period.

**Keywords:** risk of falling back into poverty; rural households out of poverty; rural revitalization; income perspective